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灵魂

于波^{1,2},王员¹

(1.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 330022; 2. 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 330029)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文化寻“根”的实践活动。文化认同承载的“集体认知”“集体记忆”“集体想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源码,文化创造唤醒的“身份识别”“他者承认”“互动共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诠释编码,文化自信强化的“主体叙事”“情感共通”“价值确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解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意义拾取、价值诠释、生成建构等向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灵魂。从文化哲学视界研究和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发展,不仅是研究该论题的一个重要思想立足点,也是需要继续深化拓展的一个研究空间。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文化创造;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9)01-0027-08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成员基于“共同想象”达致的一种民族身份认同与集体身份归属意识,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根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1]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坚

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诉求,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政治方向和理论指导。管窥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有研究成果,大致呈现4个向度:一是从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视角解读与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认为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国家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属性;二是从民族观和国家观视角回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源头,认

收稿日期:2018-1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KS046)

作者简介:于波(1981—),女,山东威海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为古代华夏观和文化族类观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三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角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价值,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实现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四是从战略前瞻视角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与方法,认为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多元与一体、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原则。综观之,国内现有相关成果为进一步从文化哲学视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也彰显了从文化哲学视界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问题的意义与价值。

卡西尔在《人论》中曾深刻阐明人是文化的存在这一命题,已隐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承载主体需要从“文化的存在”属性获得意义来源、意义诠释与意义建构,以强化中华民族成员对特定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经济—政治共同体”,也是“民族—文化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文化寻“根”的实践活动。在文化寻“根”的过程中,紧系着特定社会主流文化的承载与价值的指向,紧扣着共同的价值引领与主流文化的价值支持,折射出特定社会主流文化的人文价值与精神内涵。文化不仅是经济、政治的反映,也是民族精神建构的发动者与引领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道义合法性与文化编码性的力量支撑。为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诠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导向和实践取向,正确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活动,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源码

文化认同,简而言之,是一个特定生活区域中的民族成员对其主流文化的认可与赞同。文化不是信息要素的堆积集合,而是有意义的集成系统,也正由于其为一种有意义的存在,文化才具有公共性品质。“过去并非自然生成,而由文化创造”^[2]。作为意义符号的承载,文化预制了人们当下对意义的需求及

其参照框架,文化认同则预制了人们当下对意义的追寻、认知与判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蕴含文化寻“根”的集体身份认同过程,它是在“认知—情感—意志”的链接序列中生成的实践行动。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的理性认知、情感生发、价值引导的“意义源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参照框架”。为此,文化认同有助于实现对中华民族成员思想观念的价值整合,以“共同文化”预制的意义需求及其参照框架规范行动及行动导向。

作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共同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主题,以鲜明的先进性、人民性、包容性、开放性等时代品质发挥凝心聚力、价值引领的文化功能。它形塑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认知”、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彰显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想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将“我”与“你”凝聚为“我们”,其内蕴的集体认知、集体记忆、集体想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价值序列与信号昭示。其中,集体认知是集体记忆唤醒、集体想象凝聚的“生成底版”,集体记忆是集体认知定位与集体想象建构的“生成链接”,集体想象是集体记忆再现与集体认知明晰的“生成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为强化“我们的”价值感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成动力。

中华民族的“集体认知”是对“我们”身份的认可与确证,它清晰地告知“我们是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成员在共同地域生活实践的价值提炼,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现代性凝结升华,是对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与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是基于“我们都是中华儿女”身份认知的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起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公民身份意识觉醒下的价值共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在“知”的固基上清晰地告知与指引“我是谁”“我们是谁”,借此个体明晰意义指向与意义来源,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自觉。

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是对“我们的”记忆的保持与再现,它清晰地回溯“我们从哪里来”。作为

共同体成员对过去经验的心理反应,集体记忆不是记忆的简单个体集合,而是“集体的记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成员在历史变迁中“共同体记忆”的承载,它让我们明晰属于“我们的”历史记忆,清晰地回溯“我们从哪里来”。明晰“我们从哪里来”是身份认知与身体践行的关键链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承载“传统”的文化行动,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传统“告别”的建设历程,个体在“拥抱现代”中也陷入“我们从哪里来”的省思与忧伤。作为一种文化行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具体实践丰富与充盈着公民的文化寻“根”历程,中华民族成员在文化寻“根”的实践中对公共理性的运用、公共舆论的形塑、公共精神的培育均紧系着记忆的底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在“根”的固基上清晰的告知与指引“我们从哪里来”,借此个体明晰意义依托与价值基础,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自觉。

中华民族的“集体想象”是对“我们的”价值的赞同与升华,它清晰地指向“我们到哪里去”。集体想象是共同体成员的共同想象,即是共同体成员对未来的共同向往与构想,集体想象界分着“我们”与“他们”,也紧紧地凝聚着“我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对过去、现时、未来的递进联结形塑“集体想象”,凝结为共同体的“集体价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深层链接彰显着“集体价值”,它让我们明晰属于“我们的”价值领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有现实指向的文化建构活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与中国价值的一种凝练表达,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集体归属的价值支撑与精神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在“流”的指向上清晰的指向“该往哪里去”的集体归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自觉。

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现实载体,充当着意识形态的现实战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中也呈现一定的现实隐忧,身份认同的模糊、集体记忆的冲刷、主流价值的式微便是文化认同弱化的时代显现,“我是谁”“我们属于哪儿”的诘问即为现实

隐忧的脚注。在全球化时空,超国家组织与次国家集团在与民族国家的力量撕扯中,冲击着民族成员对于“我们是谁”的身份认知。市场化进程中,利益的多元同样可能使“我是谁”陷入混沌状态。身份认同的模糊无疑会影响中华民族成员的价值立场,进而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自觉。“现代中国集体记忆,即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源自并不断影响境内民族互动和认同,而跨境、跨海民族的共同记忆与中华文化认同存在着密切的联系”^[3]。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文化商业化浪潮、个体原子化倾向的心理需求推动下,历史、传统、记忆均被冲淡、解构或娱乐化,解构风暴、娱乐化风向将历史经典、历史价值、历史叙述等碎片化或戏说化。集体记忆也在历史、传统、记忆的冲击、解构或娱乐化中被冲刷或淡化。集体记忆的冲刷消解了“我们从哪里来”的认知,无疑影响着中华民族成员的实践判断,进而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自觉。主流文化的式微主要表征为主流文化在面对各种思潮与文化冲击中呈现出弱化之势。主流文化是一个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是一种国家表达其主流意志的文化,是一种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作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一种主流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新时代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引领与价值动力。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边缘论”等论调的不良影响与冲击下,主流文化也面临一定程度的弱化之势,直接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定位,进而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自觉。

“认同不只是心理上的自我承认和相互承认,而且也指经济、政治、文化、习俗和社会制度的自我承认和相互承认”^[4]。作为文化寻“根”的一种具体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一是强化中华民族身份认同。中华民族身份是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身份,中华民族身份是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历经千百年涤荡中谱写的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使人们在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现代时空始终能够明晰“我们是谁”,进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实现主体自觉。二是唤醒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无“根”的民族,民族

集体记忆将民族成员“共享的往事”沉淀与升华,将“共享往事”的主体紧紧地凝聚,使民族成员能够明晰“我们从哪里来”。中华民族历经了近代的沉重苦难、现代的同舟共济、当代的砥砺共进,有着共同的苦难记忆与光荣记忆,有着深刻的国家记忆与改革记忆,唤醒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即要中华民族在民族记忆共同体的凝聚中明晰来源与方向,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自觉。三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本质,它是不同主体之间的价值转化与渗透历程,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历程,价值认同规定了文化认同方向与内容,体现了文化认同主体价值倾向性与价值选择性。为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核心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需要大力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可与共享,在认可与共享框架中确认其意义感与价值感,谋求其身份定位与价值定位。

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是意义承载的集合,关乎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知、情感生发与价值导引,一定程度上定义中华民族的“集体归属”,形塑中华民族的“集体认知”、承载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彰显中华民族的“集体想象”,为中华民族深刻诠释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的哲学命题,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源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诠释编码

“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5]。文化创造是文化发展的实质,文化创造活力往往在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一元与多样的交流碰撞中生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主流文化与多元思潮的互动共生激发了文化创造活力。文化创造并不是无编码、无规则的杂乱无章的任意创造,而是有其自创性、自组织的客观规律性,文化创造正是构成文化的要素之间遵循文化自身规律而相互作用的秩序创造。然而,在多元文化共生共在生态中,是固守“傲

慢式”的本我姿态、盲从“奴役式”的他者姿态、抑或是实现“创造式”的交融互动姿态,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成员的价值诠释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建构。毋庸置疑,固守“傲慢式”的本我姿态易导向中华民族成员的一种“傲慢”心态,盲从“奴役式”的他者姿态易滋生中华民族成员的一种“奴役”心态,“创造式”的交融互动姿态滋养着中华民族成员既不傲慢、也不盲从的一种和谐共生心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诠释编码。

文化创造在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一元与多样的交流碰撞中生发,其内蕴的身份识别、他者承认、互动共生的功能特征实现着多维的平等对话、互融共通。管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实践演绎,呈现出从“我们的”传统基因中寻根,唤醒着中华民族成员的“身份识别”;从“我们”与“他们”的交融中对话,拾获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他者承认”;从“我们”与“你们”的交锋中借鉴,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互动共生”的鲜明特质,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多元文化共生共在图景中的价值导向与行动引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行动提供了价值视野。

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是文化创造的首要题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是文化创造的基础来源,从“我们的”传统基因中寻求的“我们”唤醒着“身份识别”。传统与现代不只是时间序列的一个历时问题,也是空间并存的一个共时问题,是文化的一体两面。实践证明,完全摒弃传统、脱离传统追求现代,注定是一种要失败的浮躁症或幼稚妄想症。传统不是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历史进程中的文化灵魂与精神整体的积淀,主导着人类文明的延伸,滋润着现代化的土壤,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人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6]669}。传统与现代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建构的接续关系。为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第一维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优秀基因,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唤醒属于“我们的”身份识别,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主体自觉基础。

自我与他者的交织是文化创造的重要题域。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碰撞是文化创造的重要因素,从“我们”与“他们”交往交锋中获得了“他者承认”。他者承认是“我们”与“他们”能否在多元交往中共处的前提,他者承认需要正视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关联,是文化创造的他者维度。文化冲突从根本上讲也是一种“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冲突,规避“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冲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所要解答的现实命题。解答这一现实命题,关键即是如何融合“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特性,摒除“自我”与“他者”之间思想价值观念的二元对立,在寻求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共识”中实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交融、互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与“他者”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过程,然而,获得“他者承认”,不能将“他者”视为客体或黑格尔所喻指的“奴隶”,而应视“他者”为平等共在的主体。为此,当今在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碰撞中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不是将“他者文化”视为不对等甚或矮化的对象,而是寻求“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的交融交锋,进而拾获民族群体的“他者承认”的过程。“他者承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我们”与“他们”之间如何进行文化交往的实践心态。

一元与多样的碰撞是文化创造的另一维度。一元主导与多样并存是文化创造的重要原则,从“我们”与“你们”交流借鉴中实现“互动共生”。互动共生是“我们”与“你们”在一元主导与多元思潮并存在共生共在的价值需求,是文化创造的价值维度。一元与多样的碰撞,不是一方压倒多样或多样压倒一元的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也不是一元的横冲直撞或多元思潮的谄媚顺从,而是在一元主导下多元思潮相互建构、相互依存的共生共在的“正和”共赢。从某种程度而言,多元思潮的强势攻击主要是在西方文明主导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扩张与资本主义文化传播的过程,站在西方社会价值立场上的各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喧嚣便是西方文化以“自我”为中心对“他者”文化的一种强势攻击与侵袭。为此,坚守一元主导的“互动共生”就是在持守国别特

色、民族特色与本土特色之主体性基点的同时,以全球性为尺度及时吸纳国际元素与全球元素,切实实现“全球本土化”与“本土全球化”的良性互动,在全球化进程中增添中国元素、谋定中国身份、贡献中国智慧。新时代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交融互鉴的时代唱响,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我们”与“你们”交融互鉴的价值范式。

文化创造既是对于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的一种诠释,也是对于不同文化图景的一种心态。以文化创造唤醒的“身份识别”“他者承认”“互动共生”等直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蕴的“主体确证”“集体归属”“对话共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诠释编码。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对“身份识别”的唤醒,有助于中华民族成员的“主体确证”。“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要肯定人的尊严、弘扬人的价值,使人民群众在文化实践中体悟到自己作为人的主体性存在,实现文化‘化人’和‘人化’的和谐统一”^[7]。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要从“我们的”传统基因中寻求现代转化,唤醒迷失的个体,确证中华民族成员是一个“自主的主体”。文化身份的主体确证,有利于中华民族成员明晰自我权利义务、明晰自身责任担当,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自我”与“他者”的文化互动过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对“他者承认”的拾获,有助于中华民族成员的“集体归属”。“他者承认”是他者对“我是谁”“我们是谁”的一种认同意义上的承认,作为一种文化建构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伴随着“自我”与“他者”的文化互动,“寻求承认”也是“自我”与“他者”互动中的核心要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中拾获的“他者承认”,其内蕴面对“他者”的价值思考,有助于寻求中华民族成员的“集体归属”。中华民族成员在面对“自我”与“他者”的碰撞中能够跳出“主奴”式的霸权或“主客”式的冷漠,在尊重“他者”、包容“他者”中共生共在,寻求属于“我们的”集体归属,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认同中华民族成员共同创造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对“互动共生”的承载,有助于中华民族成员“对话共识”的形成。告别一方“独白演说”,走向两者“互动共生”,在多元思潮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重要内容。为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主流文化与多元思潮的互动实践过程,主流文化与多元思潮的良性互动状况始终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度与广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中所内蕴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与中国价值,将有助于中华民族成员寻求“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共识”,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简言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唤醒的“身份识别”“他者承认”“互动共生”,建构了中华民族成员的集体归属感与文化共在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是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一元与多样碰撞中的多维创造,它既不盲从,也不傲慢的文化姿态既是文化创造的心理基础,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心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解码

文化自信,简而言之,是一个特定生活区域中的民族成员对其主流文化的积极评价与理性自觉。文化自信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它在主流价值推崇的心理体验与个体认知意义的理解对接中,指向了“我们感”的凝聚与区分“他者”的心理边界。安德森曾指出:对于民族共同体而言,“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蕴含强化“相互连接意象”的主体身份凝聚过程,它是在“时空共联—情感共通—价值共意”的生成链接中获得的思想观念。文化自信作为一种价值心态,它使不同地域、互不认识的同胞们获得一种共属的文化心理想象,建构起超越狭隘认知的“相互连接的意象”。为此,文化自信有助于实现对中华民族成员思想观念的价值引

领,以“价值共识”预制的共同想象强化心理联结与共同行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它以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为主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支撑,以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的鲜明事实形塑着新时代中华民族成员的自我肯认与他者承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将“时间连续性想象”中的民族成员紧密联结,激活并更新新时代中华民族成员的心理状态与精神面貌,其内蕴的主体叙事、情感共通、价值确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身份谋定与价值引领。其中,主体叙事是情感共通联结、价值确证彰显的“生成基质”,情感共通是主体叙事确立与价值确证彰显的“生成导引”,价值确证是主体叙事确立与情感共通联结的“生成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为强化“共同体”的紧密凝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强力粘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解码。

中华民族的“主体叙事”是在“我们之所以是”的共同视域下能动的叙事样态,在文化范式上表征为超越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跳出狭隘的自我文化或泛化的他者文化的能动建构样态。在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在物质上、精神上均试图“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主体叙事的确立就是中华民族基于五千年中华文明史、近百年的中国共产党史、七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发展历程,提炼“中国元素”、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而确立的“中国范式”。它在“我是谁”的身份定位中认清中国问题、重视中国经验、提出中国方案,明晰“我们是谁”“谁跟我们是一伙的”。主体叙事的确立是文化自信的具体表征,它使个体挣脱“迷茫”的囿域,使集体跳出“狭隘”的怪圈,在能动、积极的主体确证中明晰“我们的”方向与“我们的”主张。当今世界“资强社弱”的总体态势并未改变,主体叙事的确立使中华民族成员能清晰辨析所谓“普世价值”的实质,清晰界定群体符号边界与校正个体身份认知,借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自觉。

中华民族的“情感共通”是在“我们之记忆”的共同想象下生成的根基性情感,在文化范式上表征

为超越“狼对狼的战争状态”或“利益资源分配论”式的工具性情感、跳出狭隘的个体界域或泛化人类界域的深层联结样态。在以西方主导的市场化进程中,利益导向模式“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含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6]403}。情感共通的联结就是基于“共同祖源记忆”的共生性共同体想象、“共同历史记忆”的共在性共同体想象、“共同象征符号”的共存性共同体想象获得的“一体感”,形塑“我们的”共同命运与共同追求。有学者写道:“无论种族还是语言都无法构建一个民族。只有当人们拥有共通的思想、兴趣、情感、记忆以及希望的时候,他们才由衷感到同属于一个群体”^[9]。情感共通的联结是文化自信的深层隐喻,它使个体挣脱利益导向下“纯粹金钱关系”的工具性狭隘,跳出“单向度的人”的模式预设,在共生、共在、共存的情感联结中强化“我们的”情感与“我们的”命运。在市场化席卷的现时代,“唯利论”甚嚣尘上,情感共通的联结使中华民族成员能清晰识别“唯利论”的弊病困境,在社会关系全面丰富中形塑“人与人的关系”,借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自觉。

中华民族的“价值确证”是在“我们之所思”的共同协商下获得的价值共识,在文化范式上表征为超越霸权主义或普世论调、跳出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输送或自下而上的散漫式认知的协商型共识。中华民族作为唯一的五千年文明未曾中断的民族,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共筑中,在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南的彰显中确证“我们的”价值与“我们的”信仰。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经千百次涤荡而经久不息的价值内核,它是共同生活的民族成员们在意义诠释与事实澄明的历程中获得的民族“相似性”与民族“亲缘性”,它使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始终烙有对民族意义的深刻见解与认知。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最具时代标识性的价值取向与精神风貌,它是共同生活的民族成员们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织中获得的民族特色与民族活力。马克思主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思想,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彰显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对时代问题

与发展趋势的深刻洞见与科学预判在新时代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彰显使中华民族成员在科学性、人民性、革命性的价值框架体系中明晰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价值确证的彰显是文化自信的深层内核,它使个体挣脱世俗魅魅“价值虚无”的迷茫困惑,跳出“诸神争吵”的混沌繁杂,在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共筑中强化“我们的”价值与“我们的”信仰。在世俗魅魅“大众狂欢”的席卷下,“虚无论”甚嚣尘上,价值确证的彰显使中华民族成员能清晰指向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传承,在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借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自觉。

文化自信是民族成员对一国主流文化的积极评价与高度认可,以文化自信强化的“主体叙事”“情感共通”“价值确证”等直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蕴的“主体自觉”“情感自觉”“价值自觉”,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解码。首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建构需要自足的、能动的、积极的主体叙事,它直接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究其实质是一种能动的“集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民族气质、民族观念形成的自我肯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有赖于融合个体与共同体的理解“间距”,在共同目标与行动的指向中使个体强烈归属于群体,进而获得自足的能动意识。主体叙事的确立有助于摆脱外界强势的价值侵袭,在中国元素、中国经验、中国价值的提炼中形塑中国精神,汇聚磅礴的中国力量,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自觉”。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建构需要共通的、体验性的、稳定的情感联结,它直接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既依托具体的社会实践,也形塑于观念、价值、情感等意识的相互影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涂尔干曾写道:“一个事物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激发出了尊崇的集体情感,这情感使之从凡俗的感触中超脱出去”^[10]。文化自信强化的“情感共通”,使个体意识的建构往往伴随对社会价值

的肯认,在个体与群体的深度联结中强化共通心理体验,进而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情感共通的联结有助于摆脱利益导向模式的唯利论侵袭,在“我与你”“我”到“我们”的共通体验中凝聚一体,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自觉”。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建构需要鲜明的、引领性的、科学的价值导向,它直接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自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与主流价值相一致的共同体意识,主流价值的引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明了方向。文化自信强化的“价值确证”有助于摆脱多元思潮的困扰与迷惑,在“我们的”信仰的坚定确立中明晰方向,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自觉”。

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意识铸牢的价值内核,它在主体叙事、情感共通与价值确证的三维构筑中,使中华民族成员保持能动、积极的话语表达,联结深层的民族情感,确证清晰的价值指向,为中华民族深刻阐明“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信仰,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解码。

四、结 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一项简单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寻“根”与文化建构的文化实践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是否可能与何以可能问题都离不开特定社会中主流文化的历史性传承框定与现代性建构,作为传承与建构中华民族文化的实践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底版与价值的指向,形塑着具有最大公约数的民族身份认同与集体身份归属意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已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需要,为实现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相互链接及遵循共同体意识再生产逻辑创造了现实的文化空间与文化纽带。为此,基于“文化—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联性与互动性,可以得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文化创造与文化自信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意义源码、诠释编码与建构解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固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文化力量与价值支持,是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C]//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2.
- [2]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黄晓晨,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45.
- [3] 麻国庆. 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J]. 民族研究,2017(6):47-57.
- [4] 胡敏中. 论认同的涵义及基本方式[J]. 江海学刊,2018(3):64-71.
-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缪子梅. 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向度[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7(5):21-25.
- [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6.
- [9] 帕特里克·格里. 历史、记忆与书写[M]. 罗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21.
- [10]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敬东,汲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56.

(责任编辑:许宇鹏)

